

# 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行为

——基于文献研究的视角

何 蕾

广西大学 经济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4

**摘 要：**自上世纪以来，企业的对外投资区位选择行为一直备受全球学者的高度关注。学者们纷纷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视角出发，深入研究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决策过程，旨在探究其背后的动机和行为方式。本文立足于对现有文献的系统梳理，结合企业对外区位选择的考量因素与影响因素，综合分析企业在全球化背景下进行投资区位选择的具体行为，以期为企业制定国际化战略提供有价值的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关键词：**区位选择；跨国公司；对外投资

## 引言

在当前全球经济格局中，逆全球化趋势的兴起为中国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企业面临着日益复杂和不确定的国际市场环境，这不仅限制了其海外拓展的空间，也加剧了企业对外投资和贸易的风险。根据《2022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稳居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第二大国，流量高达1631.2亿美元，连续十一年跻身全球前三甲，并连续七年占全球投资份额超一成。2022年末，中国对外投资存量累积至2.75万亿美元，再度巩固其全球前三的领先地位，彰显了中国在全球投资领域的持续影响力和稳健增长态势。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单纯依赖国内市场已难以培育出真正具备全球竞争力的企业。因此，中国企业仍需积极寻求海外市场的拓展，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现资源的全球优化配置和市场的多元化发展。在此过程中，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质量显得尤为关键，而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则成为决定企业国际化成功与否的核心要素。

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可作为东道国逆向技术溢出的渠道，驱动其产业结构升级，还是整合国内外资源、确立中国在创新领域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关于企业如何进行对外区位选择投资，以及哪些因素能够影响企业对外区位选择的决策，已成为研究的热点。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回顾，企业直接对外投资的决策是一个涉及多个考量因素及其复杂影响机制的过程。具体而言，本文深入地系统地阐明了企业直接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决策过程，其中涵盖了制度环境、文化

差异、政治稳定性与风险等多个方面。这些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共同塑造了企业的投资选择行为。

## 一、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

对外投资区位选择是指企业在决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对潜在投资目标国家或地区进行全面分析和评估，以选择最适合企业自身发展战略和投资目标的投资地点的过程。企业进行区对外投资区位选择需要考虑东道国的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多方面因素，以及投资者自身的战略目标、资源条件、管理能力等因素。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成功与否以及投资者能否获得预期的经济效益。

以中国为例，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的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经历了显著的变化和拓展。起初，中国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周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利用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成本，进行资源寻求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逐渐多元化和高端化。近年来，中国对外投资不仅覆盖了亚洲、非洲等传统市场，还积极拓展到欧洲、北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在投资领域上，中国不再局限于能源、矿产等传统行业，而是更加注重科技、品牌、渠道等高端要素的获取，特别是在信息技术、生物科技、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的投资比重不断增加。这种转变反映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需求。

## 二、OFDI 区位选择的考量因素

OFDI 区位选择的考量因素是指企业在决定对外直接投资时，直接用于评估并确定投资地点吸引力的一系列具体、可量化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等条件。这些条件直接影响投资的可行性、风险和潜在回报。考量因素涉及多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企业选择投资地点的决策基础。

政治因素是企业对外投资选择的重要考量因素。企业在选择投资地点时，会优先考虑制度环境。杨其静和谭曼指出，专用性投资强度高的行业更倾向于投资制度环境良好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能提供更稳定的法律保障和更低的投资风险<sup>[1]</sup>。同时，吴小节等的研究表明，中国跨国企业倾向于选择制度顺差或制度逆差小的国家进行投资，利用华商关系网络或政治关系网络来克服外来者劣势<sup>[2]</sup>。以东南亚为例，这些国家与中国地理位置相近，文化上也有一定的共通性，且经济制度相对较为开放和友好，因此成为中国跨国企业的重要投资目的地。例如，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吸引了大量中国企业的投资。长期以来，海外华人华侨在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不仅熟悉当地的市场环境、法律法规和文化习俗，还与中国企业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此外，孙乾坤还研究出政治风险的高低也是决定投资安全和稳定性的关键因素<sup>[3]</sup>，政治风险带来的不确定性，意味着企业面临着投资回报下降的后果，还会引发投资者的信心危机，导致跨国公司进行资金撤离，进一步加剧了投资风险。此外，陈兆源指出政体类型和否决者的差异则在不同阶段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sup>[4]</sup>。

经济因素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庄序莹的研究表明，税收政策的稳定性和合理性直接关乎企业的投资成本和利润水平，因此，企业往往倾向于选择税负较低且税收效率较高的国家进行投资<sup>[5]</sup>。此外，汪建新指出，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会对企业的投资决策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特别是美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对中资企业的对外投资活动有着明显的影响<sup>[6]</sup>。在金融领域，美国以其多样化的金融机构著称，这些机构共同为企业提供了丰富的融资渠道和全面的金融服务。在此背景下，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和稳定性直接关系到企业的融资环境，金融发展良好的国家能够为企业提供优质的融资条件，进而帮助企业降低融资成本和风险。除此之外，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庞大的市

场规模也是吸引企业投资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企业在进行 OFDI 区位选择时需要考虑的多维度经济考量。

社会因素中，非正式制度和数字经济逐渐受到重视。祁春凌和邹超的研究表明，东道国的华裔关系资产对我国的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非正式制度距离（如文化距离）则可能成为投资障碍<sup>[7]</sup>。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 OFDI 的吸引力不断增强，张明哲和张辉研究得出企业倾向于选择数字治理环境、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数字技术应用良好的区位进行投资，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sup>[8]</sup>。以阿里巴巴和腾讯为例。阿里巴巴集团作为中国数字经济领域的领军企业，其海外投资布局紧密跟随“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阿里巴巴在东南亚的投资尤为明显，如投资 Lazada 等电商平台。腾讯作为另一家中国数字经济巨头，也在东南亚市场进行了大量投资。腾讯通过投资当地的互联网企业，如 Grab（东南亚版的滴滴出行）和 Gojek（印尼的超级应用），不仅推动了当地数字经济的发展，还增强了自身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以上两位企业的区位选择决策是基于东南亚地区快速增长的互联网用户以及数字经济市场发展而形成的。

## 三、OFDI 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

OFDI 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是指那些间接地、但显著地影响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选择特定投资地点的决策因素。这些因素通常不直接涉及投资地点的具体条件，而是通过对企业内外部环境、战略目标和风险偏好的影响，调节企业对 OFDI 区位选择考量因素的权重和优先级。企业风险水平就是一个重要的 OFDI 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它能够改变企业对市场规模、地理距离、制度质量等考量因素的敏感度和重视程度，从而影响最终的区位决策。

从地区层面来看，蒋殿春和彭大地的研究表明，国内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化成为推动中国企业向更广阔国际市场迈进的关键力量，这一制度环境的改善不仅提升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还激励其向制度距离更远的国家和地区投资，从而显著扩大了企业国际投资的区位选择范围<sup>[9]</sup>。同时，蒋瑛等指出，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企业更倾向于投资于与母国产业结构相似的国家，这种趋势在国内市场化水平提升的背景下得到了进一步强化<sup>[10]</sup>。企业往往倾向于投资与母国产业结构相似的国家，以获取协同效应和市场机会。

在行业层面，技术进步和专用性投资强度成为影响企业OFDI决策的重要因素。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发展迅速，随着智能制造转型加速，国内对工业机器人的需求持续高涨。2022年中国市场规模破500亿，在此技术发展的背景下，蒋殿春和卢霄的研究揭示了工业机器人在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显著作用，特别是在高收入国家市场中表现出色<sup>[11]</sup>。这表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正成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重要驱动力。另一方面，杨其静和谭曼的研究则指出，专用性投资强度不同的行业在投资区位选择上存在差异，高专用性投资强度的行业更倾向于制度环境良好的国家，以确保其投资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而低专用性投资强度的行业则可能因资源需求而选择资源丰富但制度环境相对宽松的国家<sup>[1]</sup>。

从企业层面来看，融资约束、风险水平、生产率和性质等因素共同作用于企业的OFDI决策。余官胜和都斌的研究表明，融资约束较大的企业在选择投资东道国时更加谨慎，倾向于选择成本较低、风险较小的国家以确保投资回报和风险控制<sup>[12]</sup>。此外，企业生产率和企业性质也在OFDI区位选择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强化了其投资于与母国产业结构相似国家的倾向；而张明哲和张辉的研究则表明，民营企业、拥有海外业务的企业以及数字经济关联行业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进行投资<sup>[8]</sup>。

最后，管理者自身的特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的OFDI区位选择决策。Gada等的研究发现，具有较高预防焦点的CEO在跨国并购中更加警觉和避免损失，因此倾向于避免选择地理距离较远的目标企业以降低不确定性风险<sup>[13]</sup>。而杜晓君的研究则揭示了CEO社会阶层与跨国公司OFDI政治风险区位选择之间的复杂关系，表现为显著的正U型关系。这表明，管理者在企业国际化战略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个人特质和背景将深刻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和未来发展<sup>[14]</sup>。

#### 四、企业进行对外区位选择决策的多种因素综合评述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是一个多维度的考量与决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推动跨国经济增长、促进技术转移和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然而，OFDI的区位选择并非易事，它涉及多个层面的复杂因素，需要企业决策者进行深思熟虑和

全面评估。以下是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一个综合评述，旨在揭示其背后的多维考量与决策过程。

##### （一）研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考量因素的综合分析

企业在进行OFDI区位选择时，需要考量的因素众多且复杂，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等多个方面。这些因素不仅各自独立存在，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使得决策过程变得异常复杂。此外，这些因素还具有动态性，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例如，政治环境可能因政策调整、政治事件等而发生突变，经济环境则可能受到全球经济形势、贸易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部分国家采取设置非关税壁垒等措施限制外来企业进行投资，以保护本国产业，在这种情境之下，中国企业难以在东道国建立子公司。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考量因素的研究多基于现有的理论框架，如制度理论、资源基础理论等。然而，这些理论框架在解释和预测企业OFDI行为时可能存在局限性。例如，制度理论强调制度环境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但忽略了企业内部因素和市场动态变化的作用；资源基础理论则过于关注企业的资源和能力，而未能充分考虑外部环境和行业特性的影响。

##### （二）研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综合分析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受到多方面因素与前述考量因素的共同影响。在地区层面，知识产权保护强化了企业向制度距离更远国家投资的意愿，国内市场化水平提升了企业投资与母国产业结构相似的国家的可能性。行业特征也起到关键作用，如外部市场冲击、机器人应用以及专用性投资强度等因素均影响企业OFDI区位选择。企业层面的因素同样重要，融资约束、风险水平、企业生产率和企业性质等都影响着企业OFDI区位决策。融资约束大的企业可能更偏好低成本、低风险的国家，而民营企业则更倾向投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此外，管理者的个人特质，如预防焦点和CEO社会阶层，也在跨国投资决策区位选择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决策网络，共同决定了企业OFDI的区位选择。

#### 结束语

在深入探讨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多个影响因素后，不难发现，无论是地区层面的制度环境、市场化水平，还是行业层面的技术进步、专用性投资强度，亦或是企业层面的融资约束、风险水平、生产率和性质，以及管

理者特质,都在不同程度上塑造着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和区位选择。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复杂而精细的决策网络,要求企业在制定OFDI策略时必须具备全局视野和精准判断。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企业面临的国际竞争环境日益复杂多变,如何有效整合内外部资源,科学评估投资风险与收益,成为每一个寻求海外拓展的企业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通过不断学习和实践,企业能够逐步掌握这些影响因素的规律和特点,制定出更加符合自身实际情况和市场需求的OFDI策略,从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期待未来能有更多关于企业OFDI的研究和实践,为企业的国际化进程提供更为丰富和有力的支持与指导。

### 参考文献

[1]杨其静,谭曼.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专用性投资与比较制度优势的视角[J].财贸经济,2022,43(05):52-65.

[2]吴小节,马美婷,汪秀琼.制度差异方向、关系网络与跨国投资区位选择[J].管理工程学报,2023,37(01):31-46.

[3]孙乾坤,包歌,郑玮.企业异质性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基于生产率和所有权视角的研究[J].财贸研究,2021,32(08):9-26.

[4]陈兆源.东道国政治制度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2000—2012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定量研究[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11):129-156+160.

[5]庄序莹,唐煌,林海波.东道国税收环境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J].财政研究,2020,(05):103-116+129.

[6]汪建新,李婷,杨晨.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企业OFDI区位选择[J].国际商务研究,2021,42(05):44-56.

[7]祁春凌,邹超.东道国制度质量、制度距离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J].当代财经,2013,(07):100-110.

[8]张明哲,张辉.“一带一路”沿线数字经济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6(05):152-160.

[9]蒋殿春,彭大地.国内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J].国际贸易问题,2023(10):36-52.

[10]蒋璘,杨骁,汪琼.产业结构差异对企业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J].软科学,2024,38(05):39-47.

[11]蒋殿春,卢霄.工业机器人应用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J].国际贸易问题,2023,(06):1-17.

[12]余官胜,都斌.企业融资约束与对外直接投资国别区位选择——基于微观数据排序模型的实证研究[J].国际经贸探索,2016,32(01):95-104.

[13]Gada V P, Popli M, Malhotra S. Geographic distance in cross-border acquisitions: The impact of CEO's psychological attribut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2024, 30(1): 101115.

[14]杜晓君,舒波,齐朝顺等.CEO社会阶层影响了跨国公司OFDI政治风险区位选择吗?——基于中国跨国公司微观数据[J].运筹与管理,2020,29(03):217-228.